

加以歸納，我們眼前便出現一個大中國文化的總體形象。這種歸納不僅是超意識形態的，而且是具有巨大包容性的。我們把彼此的缺陷互補為共同的文化優長，這就是一個統一文化之內多元並存的駁雜與繁富，恰好應驗了我們久遠的文化加入與改造的期待。

一方面，我們繼續把目光投入黃土地邊界以外，讓那些薰風浸潤我們刀削一般的乾渴的高原與沙漠。一方面，我們反顧自身，承認此種多元秩序的合理，不是如同往常地把它重新整一，而是在一個文化母體之內滲透若干新質和異質，借以潤滑我們的腸胃，讓我們在自身體內開始新陳代謝的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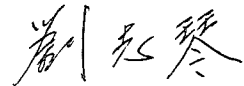
也許我們會結束那衝突又沉寂、開啟又閉合、始終畫着那阿Q式的圓圈的悲劇。二十一世紀對中國人來說仍然是悲涼的，它只是一個未知數。

謝冕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研究所所長

文化研究應輕裝前進



二十世紀80年代的中國是以歷史的新時期而著稱於世界。在這一時期，中國出現引人注目的持續的文化熱，是包括文化史、文化理論、文化建設與一系列重大文化課題的研究性熱潮。它的發展已經超越傳統的文史領域，深入各門學科，成為理論界、文藝界、科學界、教育界、新聞界共同研討的課題。高等學府、民間社團、科研機構以研究文化為熱點，企業、城鎮、校園、街道以關注文化為時尚，其參加人數之眾、討論議題之多、發表論著之豐，為1949年以來所未有。

80年代的文化熱，使人們很自然地想到五四前後的文化熱，兩次文化熱相距六、七十年，幾乎間隔兩代人，而課題又那麼相近、相似、重疊、交錯，論題中的意向還可追溯到鴉片戰爭後第一批睜眼看世界的先驅們的思慮。這一百多年來文化研究的進程表明，現代化尚未完成，有些問題甚或徘徊百年未能尋到答案。然而這又不是簡單的重複和延伸，百多年來的中國歷經滄桑，社會面貌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一變化使80年代的文化研究成果，無論從數量上還

是在深度的開掘方面，都具有前所未有的廣度和力度，從三方面超越「五四」時代：(1)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把改善民族心理素質作為文化發展戰略的出發點和歸宿，提供了「五四」時代所沒有的社會條件；(2)避免了「五四」時期文化史學科建設的偏頗，使文化研究滲入多門學科，以綜合化、一體化的發展趨勢，推動了當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3)「五四」時代是喚起跪着的奴隸



站起來，打碎封建制度的鐐銬，恢復人的地位。80年代文化研究的主體性思潮，是要求人的自我實現，轉換人的觀念，提高人的價值，發揮人的潛能，逐步實踐馬克思指出的，共產主義社會的基本原則是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是更高層次的人的覺醒運動。這是「五四」英烈們夢寐以求而不能企及的新高度。

然而，文化領域又曾經被長期冷落，冷落到沒有一所高等院校設置有關課程，三十年沒有出版一部文化史的綜合著作。一門學科何以在一個國土上這樣大落大起，大冷大熱？不能不說是非正常的現象。

從怎樣對待傳統文化來說，本是理論上帶有普遍意義的一般課題，從實踐中說又並非中國所特有，為甚麼在中國竟成為極為敏感的問題，從五四以來就爭論不息，弘揚傳統與否定傳統的兩極對峙，有時演化成政治爭端的手段，甚至從文化發難發生十年浩劫的文化恐怖活動？而某些少有爭論的國家卻未必沒有處理好傳統文化的問題。探索這一問題並非本文所及，但有一點現象卻不能不正視：

80年代的文化反思發端於對十年浩劫和建國以來左傾錯誤的反省。強烈的批判性、現實性使文化研究的發軔成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思想解放潮流的一部分。人們把現實中難以解決的疑難、困惑，全部歸罪於傳統文化，或者寄寓從文化上解決一切問題的期望，使得某些論題的闡發沉重地揹負着不該有的負擔，從而誇大了文化的作用，混淆了政治與學術的界限。同樣的，與此相對立的另一方，也把新舊體制轉換中難以避免的弊端，改革開放帶來的某些負面反應，甚或決策上的偏誤、自由化的傾向，又統統歸罪於文化研究的原因，給文化熱套上不該有的罪名，也同樣誇大了文化的作用，混淆了政治與學術的界限。

文化，就是文化，無視它的作用或誇大它的作用都同樣會使文化研究陷入不幸的境地，歷史的教訓，記憶猶新。文化研究只有卸下沉重的包袱，才能走出一冷一熱的循環，按照學科發展規律輕裝前進，這才是中華文化大發展的最佳時機。對二十一世紀，我懷抱着這樣的希望！

劉志琴

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文化史室主任及研究員